

第十二章 不予理睬

外务省一致接受

柏林时间7月26日晚上9点20分，在发出《波茨坦公告》的同时，杜鲁门指令战时情报局：立刻用一切手段，让日本国民都知道这一公告的内容。第二天，战时情报局(OWI)以国内、海外两部部长的名义，向在波茨坦的总统报告了他们根据指令所采取的措施：“关于日本的公告，采取如下措施。

下午3点10分(东部战时时间)，收到了公告原文，两分钟后，在OWI新闻室、怀特豪斯国务院同时发表。下午4点(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5点)，我方西海岸的短波发报机开始用英文广播。重要的部分4点5分用日语作了广播。日语全文是OWI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支局翻译的，由华盛顿国务院的语言专家、在电话中校对后才进行了广播。

圣弗朗西斯科的最初广播是下午6点(东京时间上午7点)，之后，西海岸11号短波发报机、火奴鲁鲁短波发报机、塞班的中波发报机都重复了日语广播。西海岸用20个国家的语言作了广播。所有预定节目都停播，重复着公告的播音。另外，还用罗马字日语送到了太平洋和中国的前沿基地，这些是正式的日本语译文，像是利用对前沿基地的广播节目和传单形式进行的。”

舞台再重新转向日本。如果说首先听到这历史性公告的当时的“日本之耳”——外务省，除了在本省防空洞内进行的莫尔斯收报以外，在都下调布町国领的YM旅行招待所，还有一个由40多位第二代美籍日本人组成的语音研究机关，同盟通信社在埼玉县

川越小学里有一个莫尔斯接收所。另外，在爱宕山，同盟通信社和NHK共同拥有一个语言傍听室，加之，陆军在东上线上福冈，海军在西武池袋线东久留米各自有收听所。因此，在这些地方的人们都听到了《波茨坦公告》广播。

外务省陷入混乱是不言而喻的。27日清晨，负责情报的太田三郎课长（正式叫做调查局第三课长）被值夜班的人在电话中告知：收到重要情报。

“当时，我住在中野的野方，是急忙乘电车来的，路上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外务省被烧，移到了现文部省的四层楼上，在原外务省遗址地西南角的接收室（即国领广播室的前身），我先赶往那儿。那里放着德国产海氏电报机，它是接受莫尔斯文字的先进报机。我想它捕捉到的电波可能是美国向中国发的战时情报。所以，也许能比国属电台早些收到。

我到的时候，《波茨坦公告》的全文已接收完。当时的情景虽然模糊不清了，可的确记得，当时东乡大臣在电报机旁，取下似乎是电文的校样，急不可耐地看着。如同大臣直接取下电文阅读那样，外务省的干部都处于一种紧张的兴奋状态。”

27日清早，在文部省的四层楼上，关于公告之事，按惯例召开了外务省干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四、五个人：次官、政务局长、条约局长参加了会议。

首先，听听澁泽信一先生（当时的条约局长）是怎么说的。他说：“在哪里怎样看到《波茨坦公告》的，现在记不清了。可我看到的《波茨坦公告》的确是英文，只是有看不懂的地方。比如，有的带冠词，有的没有，意思我就弄不清楚了。因为是第一封快报，对其内容不能只大概其明白，因此，吩咐第一课长下田武三君，要他对公告的内容推敲研究。

不管怎样，我读后首先想的是，对天皇制公告一点儿也没涉及，感到联合国没考虑废止天皇制啦，加以限制啦等。领土问题上，台湾、朝鲜从开始就提出让我放弃，所以，这是不得已的

事。关于占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公告中只写有‘进入日本领土的几个地区’，即占领某些特定的地点，不是全面占领，并解释：只是东京啦，大阪啦这些重要地带。但是，我的这种预测过于乐观了。

外务省干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是否首先接受公告，大家一致同意应该马上接受。”

安东义良先生（当时的政务局长）说：“首先我注意的是，正在波茨坦的斯大林没有参加公告的制定，这意味着什么？苏联当时对我方提出的派近卫特使访苏之事，一直态度暧昧。因此，即便这一公告利于日本接受，可是，马上表示接受又显得草率。

逐条研究后，担心的就是天皇制问题。宣言上只写着：日本的政体由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听了对方的广播和有关情报，已经感觉到对方普遍存在废止天皇制的舆论，在国务院中也有那种考虑。苏联如果以某种形式参与筹划的话，就有可能要求改变政体，可公告中没明确写上，这也许是为了调和那种强硬论，而实际上是承认天皇制的继续存在。但想来想去也没理出头绪。

公告中还有一点，我认为不错，那就是没用‘投降’一词，而是写着‘结束战争’。如果说投降，军队不会同意，终战的话就觉得似乎行得通。之后，不说战败，称停战，因此这时我就下了决心。现在想来，当时看问题有点表面化了。

我在干部会上发言说：既然苏联的态度不明确，马上接受公告又不受欢迎，还是暂时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为好。”

松本俊一先生（当时的次官）说：“停战后，我一直保存着为外务省写的记录稿，看看它会比记忆准确。那上面这样写到：‘在27日早上的定例干部会上，我认为，作为日本，除最终接受公告结束战争外，别无他路可走。本来，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属文字游戏之类，果真讲和的话，必须进行一种交涉，因此，由于以前军人的战斗而使用的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就没有采用的必要了。这次公告使我们鼓足了勇气，因此，让国民如实地看到了公告全文。

再有，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拒绝的态度。

作为日本，此时沉默是最明智的，因此，适当的做法就是指导报纸不加任何评说地发表公告全文。我的这种想法得到了一致赞同，并报告了大臣。”

这样，外务省干部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东乡外相进宫，报告给陛下，接着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下午举行了阁议。但军人一出场，就把外务省干部会上的这一结论，扭转到料想不到的方面。

军队和政府公告的轻视

外务省干部会上取得一致意见后，东乡外相于27日上午11点进宫，向陛下报告了会议决定。

木户幸一先生说：“《波茨坦公告》的正式译文是从今日进宫上奏的东乡君那儿看到的。看后，拜谒陛下，关于《波茨坦公告》谈了许多看法。象往常一样，谈话是以座谈的形式进行的，可关于谈话的内容，并没留有特别的印象。这是因为觉得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价值吧。

当然，陛下很清楚波茨坦会谈之事及出席人员，我每天拜谒时也谈过，但是，不记得陛下对那次会谈特别关心。但陛下确实在注视着这次会谈。在我看来，波茨坦会谈，即联合国究竟会对日本提出什么要求呢？是善意的呢？还是悲观的呢？不管怎样，因为我国已处于临近无条件投降的境况，丝毫不能想象敌方会举着双手奔向我们的怀抱。我还算作了不利情况下的准备，意外的是，对方会把要求用公告的形式‘强迫’于我们。

那大概是联合国决定的吧。我方提出派近卫君作为特使出访苏联，苏方让我们等待莫洛托夫外长从波茨坦归来。因此我也想到，会谈中肯定谈到了我方提出请求出访之事。会谈内容突然以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世，这样就不存在政治性交涉的余地了。我想

在这种限度上，事态已到了最坏的时候。

但是，仔细一看，公告中还略有伸缩的余地。也可以认为，从日本的情况来说，这样的余地也是不得已的。

最重要的还是天皇制，对于天皇制的存废公告未有谈及。如果要写上实行共和制什么的话，焦土战也会不得已而发生吧。虽然这样说，我方考虑的交涉办法已不存在了。对此，日本是无能为力的呀！”

木户内府因此断定：交涉的通路已不存在。的确，今后只能在接受或者是拒绝《波茨坦公告》这二者中选择其一了。但是，公告所提的苛刻条件是不能被接受的。

27日上午，召开了由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这不是因为《波茨坦公告》的发表所召集的应急会议，而是定例召开的，因为公告的偶然出现，只不过作了与内奏同样意思的说明。据东乡外相的回忆，在这次会议上，军令部总长说过：“不久这一公告就会传到社会上，因此，应发出公告不妥的大号令。”当时的丰田副武大将在《最后的帝国海军》中谈到：“在这天的会议上，因为公告内容还没全部译出，所以关于公告甚至没成为会议的议题。”

这与前面的说法稍有分歧。准确地说，在听到公告的瞬间，外务省、政府、军队都还没能马上明白其内容，这就是当时的真相吧。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先生这样说道：“当时，因我家房子被烧，就把床搬到平日总空着的首相官邸的法制局长官办公室住着。27日清晨，从外务省得到了《波茨坦公告》的报告。我记得看的是文书。之所以没用电话传告，是因为我没有把它看作象‘苏联参战’啦、‘投下原子弹’啦这种惊人的、即必须马上采取对策的紧急消息。当时是带着‘敌人又在作种种策划’这样的感觉看公告的。过后，铃木总理也看了，他只是轻轻地说到‘这不是开罗宣言的翻版吗？’

我逐渐明白这一公告的严重性，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结束、

下午召开阁议时，东乡外相说了‘它是停战的钥匙’这句话之后。但是，不记得会议对如何尽早做出回答一事非常的关心，并进行了讨论。只是就如何作为新闻消息发表交换了意见。正因为公告态度的严重性，由于‘不予理睬’这种毫无道理的态度，事态自然向更严重处发展了。”

“不予理睬”这句奇妙的日语，是它给了美国以投下原子弹的口实，给了苏联以参战的口实。

被错译的总理谈话

在当时的情报局总裁下村宏的《停战记》中，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时、阁议的讨论情况，作了如下记载：“就本公告的新闻发表问题征求了意见，外相说延期发表；冈田忠彦厚相说：早晚它也会传向世界，因此，希望早日发表；阿南陆相尊重主管大臣的意见，以明确民意之趋向。

我非常关心的是公告即将成为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日本的如此态度各国会如何反应呢？假如明天的报纸全然不登关于公告的消息，欧美、大东亚各国都会断定：一定是日本惊慌失措。反复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不下来。即使在国内见到记者团，他们也会问：还不发表吗？不能发表一定是因为讨论定不下来吧？即使不直接回答，我们连这样重大而紧迫的新闻都不能报道，还有什么颜面呢。因此，这样也不好。如果发表了，一点看法也不谈，也还是不妥。作为新闻登载原文的同时，至少还点缀上几句为好。

我谈了自己的意见后，在这一方针下，和松本外务次官、安东局长、久富情报局次长、井口情报局第三部长、太田三郎外务书记官等聚集在首相官邸，我们商定对公告作概括报道，不作为重大问题；关于内容，不涉及苏联，不加任何评论。据此，决定了《波茨坦公告》发表的形式。”

松本俊一先生(当时的外务次官)说：“总之，在阁议上东乡外相同意今天早上干部会议上决定的以‘漠然置之。’发表的意见大体就这样决定了，我也安下心来回了家……”

还有太田三郎的一位助手说：“我被叫去是为了核对发表的日文公告，与原文是否有误。我是在正在举行内阁会议的隔壁屋子里进行核对的。当时，松本次官、安东局长，还有陆、海军军务局长在场。我想，他们是在决定发表时是否删掉哪一条吧。据我所见，发表的日文公告较好地抓住了公告要领。国民肯定会据此了解公告内容。只是，政府对公告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

但是，一看28日早上的报纸就觉得麻烦了。各家报纸都用三段或四段文字登载了公告的摘要，没作重大新闻报道，一部分报纸还使用了‘不予理睬’的标题。就是说已开始进行评论。‘这就麻烦了！’因为外务省正有意以公告为契机，推进和平的进程。无论是大臣、还是次官、局长等干部都不是什么置之不理的态度。因此，报纸上出现这样的标题将会妨碍和平。

但是，当时我又觉得，置之不理不是作为政府发表的正式意见，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可是，后来却不行了，28日会见记者时，铃木总理断然说到‘置之不理’，这大概是总理打算‘漠然置之’，而说出‘不予理睬’一词的吧。同盟通信社在把总理的这一谈话向海外传播时，却把‘不予理睬’译成了‘无视’。”

逼迫政府表态的军部

对《波茨坦公告》不能若无其事地静观下去，最后内阁会议决定，概括出温和的八条要领，以政府漠然置之的态度发表。28日的报纸听从了政府的旨意，没把公告作为重要新闻报道。不过，虽说是战时御用报纸，如果加上对政府态度的观测就不是记实性的了，有的报纸写到：“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唯有更坚决完成战争。”

但是，从这种报道上只是看到这些报纸的态度，当时多数国民也只会推测说：“公告又是敌人的谋略宣传吧！”这才是政府想达到的目的，可是军队不会允许。

松本外务次官在停战后补写的手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第二天即28日清早，迫水书记官长从总理官邸给我打电话说，关于《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形式，大西龙治郎军令部次长（海军特攻队之父，停战的第二天早上自刎）等，对我们的决定作了激烈攻击，说要对公告进行某种谴责，问我怎么办好？我回答说：关于发表形式，始终要按照昨日阁议的决定，此外别无办法。

可是，外务省得知，在今天早上大本营和政府间的情报交流会上（东乡外相因故缺席），军方，尤其是统帅部，关于公告提出了强烈意见，决定总理说明态度。情报局总裁要在晚7点后发表谈话。

于是，我马上追问迫水书记官长消息是否属实，让他坚持昨天阁议决定的方针。书记官长说，因为军部叫嚷不休，在那天按惯例会见记者时，总理不得不说了一句涉及公告的话。但是，幸而情报局总裁谈话时取消了那样的内容，可总理会见记者时的谈话被各国看作是日方拒绝《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如同BBC广播的‘日本无视《波茨坦公告》’那样，认为‘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事态变得如此严峻，不能不使我感到无限的悲伤。”

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先生说：“在28日上午大本营和政府的情报交流会上，阿南陆相的发言使我为难了。他说：关于《波茨坦公告》，政府不明确某种看法，前线的将兵不会同意。不过我想，不只是阿南先生，还有军人直接打电话逼我说这种话。东乡外相不知为何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不管怎样，东乡外相强调过：不得附加政府的评论，但在此时我势单力孤，于是和米内海相商谈，希望会后请陆、海军两大臣、两总长、两军务局长留下，让米内先生劝劝他们。

米内先生说：不好办，还有什么好办法吗？于是我们商定

下午在总理会见记者时，只是稍微谈点意见如何呢？就是说，因为不能发表政府的意见，就用会见记者的形式稍稍谈及吧。”

费神于报道

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先生继续说道：“因为政府目前不愿发表声明，所以就利用会见记者这一途径，温和地谈点看法吧。我这样说了，最后和两军务局长的协议，作为首相在记者会上的答辩，把‘政府不认为重要而不予理睬’，改作‘不太’重视，目前‘想不予理睬’。但无论如何，我已那样决定，事前又征得了总理和记者团双方的理解。我对总理说：会见记者时，因为会如此提问，那样回答比较妥当。总理也许是想得比较简单，只是说到：‘可以。’

于是，我又去了记者室，《朝日新闻》社的吉武信君（后为政治评论家）、《读卖新闻》社的池田禎治君（后为民社党议员）等正等在那里。当我说提问可以涉及《波茨坦公告》时，他们问到：‘真的可以涉及？’我恳求到：‘实际上不希望你们涉及。’当时我如果不说可以涉及，新闻记者也是不会随便提问的——”

从1945年7月30日的《读卖新闻》中摘录出的问答是：“问：可以看出，对于B29对本土的舰炮射击及机动部队进行的空袭，国民希望采取积极的对策，首相对战局的看法如何呢？

答：略。

问：对于27日的三国共同宣言，首相如何看待？

答：我认为，那一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谈的翻版，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重大价值，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唯有坚决完成战争。”

问题本该到此为止，可记者们又提出了如下问题，因粮食基本配给量的减少正日益紧迫，政府将如何解决呢？随着战局急迫，国民强烈希望政府强化政治，政府作何设想呢？因为粮食困难和通货膨胀，国民正丧失道义。我们认为，为防止问题更加严重，

提高生产力，必须确保国民最低限度的生活，首相所见如何呢？因为空袭，国民担心军需生产，尤其是航空机的生产，其状况如何？对这样的提问，总理作了冗长地回答。

通过这一新闻报道，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许多国民对公告的报道视而不见，他们所关心的是怎样弄到越冬的粮食和衣服。1945年的夏天气温很低，人们都担心着稻米的生长。

外相大怒

30日，东乡外相看到这个报道非常生气，严厉责问迫水先生。迫水书记官长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极力为自己辩解。外相在《时代的一面》中写到：“但是，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却有政府对公告置之不理的报道，因此，我马上向内阁指出，报道与前日阁议的决定不同，并提出抗议。他们说是军部提出了拒绝《波茨坦公告》的意见，首相召集陆、海军大臣及两总长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协商，结果，总理屈服强硬派的意见，因此，会见新闻记者时就说决定对公告置之不理。这样一来，报纸自然就大加报道。

我过后才知道此事，虽然相当不满，可因无法取消也就听之任之了。美国报纸报道说：日本拒绝了三国共同宣言，杜鲁门总统关于使用原子弹的解释及苏联参战声明中都把这一点当作理由，我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幸而且不利的事。”

我再把话题转一下。当接收到《波茨坦公告》时，外务省首脑判断：“照此可以走向终战。”为此，应先征得重臣们的理解，向他们传达并解释公告内容。担任这一任务的就是加濑俊一先生。他说：“我在7月份是政务第五、六课的课长，但实际上继续做外相秘书官的工作，外相在读了公告后说‘这可行’，我心领神会，马上开始行动。

首先，用电话和迁居日光的重光先生联系。日本外交不通过东乡、重光路线，寸步难行，因此，我第一个和重光先生取得了

联系。记得我正在打电话时，芦田先生来到了外务省，和外相及我三人做了交谈。然后，我去住在小田原的近卫先生处，顺便也到了平沼先生那里。

冈田先生那里，是我的亲戚迫水君去的。如果稳住了冈田先生，米内先生才会行动。通过熟悉的松平内府秘书官长提前和木户先生打了招呼。之所以与上述这些人联络，是因为一旦决定接受公告，必须要去上奏陛下，取得理解才有较大的可行性。总之，外务省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因此，我想东乡外相听到总理‘不予理睬’的谈话，生气也是自然的。”

首相复杂的心境

铃木贯太郎总理留下了《停战的表情》这样一本小册子，这是战后不久整理其口述而成的，是铃木总理亲自保留终战情况的唯一的一本书。其中，也涉及到了“不予理睬”问题。作为本人的辩解，记下了当时的心境：“《波茨坦公告》——一看就明白它是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条件。时值7月27日，帝国政府马上研究了公告内容。其内容就是联合国对日本开始最后的攻击前，向日本通告所提出的条件。而且似乎觉得，该公告明确担负着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任务。

但是，高喊着‘一亿玉碎’的军部认为该公告毫无价值，应继续做好在本土迎击(敌人)的准备。结果决定，对公告不表示看法，报纸上也作了帝国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的报道。但是，国内舆论和军部的强硬派逼迫我彻底反抗这一公告，以昂扬斗志，甚至还极力主张正式表明态度推进事态，否则，只会无益地招致国民的困惑。因此我出于无奈，在7月28日会见记者团时，回答说‘我认为该宣言不必予以重视。’

过后，我对于这句话觉得非常遗憾。逼迫我这样回答的就是当时军部极端的抗战意识和我自己缺乏冷静地分析。我的谈话很

快被外国报道，他们大加宣传我方拒绝公告。于是，这又成了后来苏联参战的绝好的理由。由此美国加剧对我国的攻击，从近海用舰炮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波状攻击，其意图在于要从根本上毁灭我方的战斗力。我越来越感到他们的目标是冲绳军事基地和本土上的飞机，而且我甚至感觉到了这种攻击正式开始的某种可怕。”

在记者会上，听到首相回答：“因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所以不予理睬。”《读卖新闻》记者池田禎治先生说：“听到‘不予理睬’，也没想到总理用了不妥的词语。因为是在当时的气氛中不得已那样说的；所以，对总理的心情我心领神会。因此，会见席上没有记者提出关于置之不理的反驳意见。另外也没想到，总理嘴上说是开罗宣言的翻版，而内心是想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因为此时战局已完全不同了。”

外务省调查局第三课长太田三郎先生说：“同盟通讯社在对海外广播总理谈话时，把‘不予理睬’译成了‘无视’，我是当时指出其中的细微差别、并要求修改的人之一，但是，我难于赞同那种断言总理置之不理的发言，是造成美国投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的口实的说法。我想，即使接受公告，也一定会发生那种事态。”

急于对苏交涉

出于无奈，总理只是作了“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的发言，但政府并没有拱手等待着原子弹降落到头顶。东乡外相虽因总理的发言生气，但为了收拾那一发言引起的后果，又急于登上“对苏交涉”这只船，为此对佐藤尚武驻苏大使进行了鼓励。

但是，不管怎样，本国那种鬼魂附体、头脑发热的空气，与驻外机关冷静、客观的判断的分歧，怎么也协调不起来，结果时不我待，失去了时机。让我们听听原子弹即将投下之前那些急不可待地对话吧。

收到《波茨坦公告》，东乡外相很快作出了以漠然置之的态度静观事态发展的主张，因为当时正对苏联提出派遣近卫特使的要求，以此先看苏联的反应，通过苏联辩明事态的真相。因此，作为当然的措施，给佐藤大使打了好几封电报。佐藤大使也对《波茨坦公告》的出现感到吃惊，打电报询问本国的意图，陈述自己的看法。

7月27日莫斯科发，致东乡外相第1458号电报：

“关于近卫特使的使命，根据本国的训电说：近卫公入苏后自己申明意图，在此之前，所提内容暂不公开。如此来商量问题吗？但是，在提议结束战争这样的大问题时，没有确定的决心，拐弯抹角是不会说动苏联的。

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是威吓日本的巨弹，表明了三国进行对日最后攻势的决心，在这种决心面前，无法想象身为同盟国成员的苏联现在会出面调停。还有这个公告也是对日本通过苏联进行和平试探的反击。”

第二天，即7月28日发，致外相第1476号电报，佐藤回答了本国接连发来的指令：“一……三(略)

四、BBC广播：日本无视26日的《波茨坦公告》。但本大使没有从本国收到那样的公电。

五、最初给本大使的训电只是说：就派近卫特使一事取得苏联的理解。接着来电，促使苏联居间调停，进而在第二次的电报中说把斯大林捧为世界和平的提倡者，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告知我方的意图，实在遗憾。另外，如苏联调停不行的话，说还有其它办法，那种办法在哪里呢？本大使无法估计，感到困惑。”

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困惑不解的佐藤大使的神态。同一天，东乡外相给佐藤大使的第952号电报还这样说：“关于《波茨坦公告》，苏联知道吗？因为本国在等待苏联关于派近卫特使一事的回答，所以，想了解这与《波茨坦公告》有怎样的关系？苏联是否和英美讲了近卫特使一事？另外，关于对《波茨坦公告》的处理方

针，是等待苏联对我方要求做出回答后再进行研究，望尽快回答。”

佐藤大使没有办法，只好会见苏联代理外长洛佐夫斯基，催促他回答，但被敷衍说：因为斯大林在柏林，无论如何要和他联系，现在无法回答。

7月30日发，第1484号，佐藤大使致东乡外相的回电略有些发脾气的感觉：“一、不得不认为：斯大林当然知道《波茨坦公告》，近卫特使一事英美也会得到通告，《波茨坦公告》就是三国对日本态度的表示。

二、最重要的是《波茨坦公告》强调要日本投降，即便是斯大林，对这一点也不会动摇。试图解释陛下要避免更大流血的仁慈，把斯大林捧为世界和平的提倡者。但从美英的角度看，他们会说，如果日本马上无条件投降，这种意图才会实现。我估计斯大林还想在日本投降之际，关于满、中、朝问题向美、英、中施加重压，使其贯彻自己的主张。苏联还有那样的实力，现在它还有必要和日本缔结协定吗？我想这一点你的观察和目前的实际有很大的出入。”

对此，8月2日东乡外相发出第973号电报，作了回答：“从数次贵电，我清楚了您的意思，战局急迫，在敌人登上本土前结束战争已为时不多了。但在国内，马上决定和平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目前，为了终战，只有争取苏联的调停一事，在政府，统帅部中间决定了下来。根据这一决定，关于具体条件，正努力收集各方面的意向。外务省认为，正把《波茨坦公告》作为终战条件的基础。所以，目前的紧急任务，就是让苏联同意派遣特使一事。您好好考虑一下这种国内情况，您也有自己的看法吧？但不管怎样，希望您努力激起苏联的热情，失去一日，会悔恨千古。”

实在是急不可待了。

加濑公使也催促接受公告

在佐藤大使和外相来往电报过程中，驻瑞士的加濑俊一公使发来的电报，8月1日到达东京。他在电报中详细比较了《波茨坦公告》和《克里米亚宣言》(对德投降要求)，认为《波茨坦公告》条件对我方有利，应该接受。这在当时，与国内条约局第一课长下田武三先生8月9日完成的对《波茨坦公告》的逐条解释一起，被并称为最有见识的判断。内容如下：

“驻瑞士加濑公使发，致东乡外相，第837号 十万火急，关于《波茨坦公告》的观察：

一、对我国与对德国的态度相比有显著不同。对德国没有用现在这样的语调和形式详细地附上条件，并呼吁给予一定的保证。其中还有：

(1) 没触及天皇及政体。

(2) 承认日本的主权。

(3) 承认行使主权的国土。

(4) 在使用所谓无条件投降的字句时，只限于日本军队，不是对日本国民和政府说的，有考虑维护我国体面的迹象。

(5) 军队解除武装后，让他们返乡生产。

(6) 保护和平产业，允许取得原料，参加世界通商。

二、以下诸项是德国的完全失败：

(1) 全部国土被分成四个区域，由美、英、苏、法四国分别占领。

(2) 首都柏林也被四国分割占领。

(3) 在德国没有了主权者，没有了政府，所有特权都移到了由各占领国最高指挥官组成的中央监督委员会。

把以上两方面联系起来考虑，难道不觉得其中的差别是如何的显著吗？但是应该想到，我国如象德国那样惨败时，这种差别

就有不复存在的危险。

三、劝告动机。德国溃败后的欧洲，形势暗淡，复兴无法着手，粮食和燃料不足，甚至担心怎样渡过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冬天，结果陷入需要美国大规模援助的状态，而且不得不看着苏联势力扩张下去。可以认为，美国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没有打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招牌，事实上要放宽条件，早日和日本言归于好，所以美国争取了主动权，发出了三国公告。但是，这应该看作是美国的政治动向。如果把此看作是美国在战争中疲劳了，或断定它是离间日本军民的谋略，都是非常有害的。

四、苏联当然知道这一公告的内容及其发表的时机。由此应该看到：苏中和英美正在就东亚问题的处理，进行大致的协商。另外，从苏对美英的观点来看，不得不认为，关于苏联侵入亚洲的限度，美英也正在做某种程度的估计。因此，据我观察，根据我国对该公告的态度，苏联会向我方提出某种劝告，这种可能性较大。”

这封电报转给了佐藤大使。佐藤大使8月5日又发电到东京，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与加濑公使有完全相同的感受：“如果早日通告日本提倡和平的决心(即接受公告)，还有可能进一步放宽条件。但是，无论如何放宽，象德国一样，也摆脱不了对战争责任者的处罚。战争责任者如果真是忧国之士的话，从容牺牲，也确是不得已的吧。”

交涉的当事人都这样说了，东乡外相也只好认输。但是，佐藤大使，加濑公使议论都是正确的。这封电报到达的第二天，广岛终于被投下了原子弹。